

论 文 提 要

建党70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失败，前进和后退，发展和停滞，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好与不好而发生的。要结合好：①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最根本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研究国情，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从党的历史上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到形成和发展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②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国情出发，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而没有这种结合的实践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因丢掉方向而在总的方向上步入歧途。③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坚持中发展，并形成新理论。新理论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同时又是保证进一步结合好的理论前提和关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在新民主主义这一新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必将象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一样，将把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引向新的更大胜利。④必须坚持与“左”、右倾错误倾向作斗争。党内的错误倾向是实现相结合的严重障碍，必须不断排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在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⑤必须有一个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人民意愿和呼声的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刘贵田

中国共产党7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在中国近代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造了雄伟壮丽、永不磨灭的历史业绩。在这70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靠什么“魔力”干出这番宏伟的事业呢？1990年12月30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十二大、十三大，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建党70年来党的建设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纪念建党70周年，就应该深刻理解这一基本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结论，认真研究和总结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的成功经验，从而把我们今天的事业推向新的胜利。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而又很不容易的事情。建党70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失败，前进和后退，发展和停滞，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好与不好而发生的。历史表明，这种结合做得好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就能得到预期的胜利；这种结合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主观指导上的失误，使事业遭到挫折。那么，从建党70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可以寻到哪些轨迹呢？兹述管见如下：

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最根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唯物性、辩证性和实践性三个特点。三性水乳交融，其核心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怎样，关键取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的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研究国情，这是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

从党的历史上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到形成和发展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教育党员干部要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②的问题。通篇文章反复强调的基本精神是只有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作调查，才能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实际情况的结合。1937年，他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论证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既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③那么，中国的“实事”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中国的情况确实很特殊：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无产阶级队伍不大，但是能够动员起来的农民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以外，特别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还能够从其他一些阶级中找到同盟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革命运动？只有从中国的国情特点出发，才能找到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一个长时间里，许多共产党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相信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是正确的，应该以它为指导。当时，由于实践不够，缺乏经验，没有或很少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应该怎样把这些正确的东西运用到中国革命中去。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了两次严重挫折，固然反映了全党当时的幼稚状况，但是，就造成这两次挫折的主要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右倾投降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对中国的上述国情特点不了解，因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左”右倾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他们正是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特点出发，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最早最好地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于是才产生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得，也能够争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配合以其他各种形式斗争的问题；产生了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的革命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等等。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独特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认清国情为条件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但是，这时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生产力十分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可以把资本主义的一切遗产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就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党偏离甚至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离开了国情，不顾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急于过渡，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致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述，他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发生。我们党正是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取得了对国情的新认识，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从而使我国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结合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④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把这四句话在逻辑顺序上做了调整，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⑤它告诉我们，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一定要从国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研究我国的特殊情况，从中找出内部固有的规律，做为制定政策的客观依据。路线和政策确定以后，在执行中还必须同具体实践相结合，接受实践的检验，使之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这就使党的思想路线更加完善化和系统化。可以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七中全会，这12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成果，都离不开对这条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70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表明：什么时候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得好，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得就好，什么时候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就不好，就发生失误。我们只有坚持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国情特点出发，我们的国家才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并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二、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既然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结合，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自然成为实现这种结合的重要条件之一。讲从国情出发，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而没有这种结合的实践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因丢掉了方向而在总的方向上步入歧途。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正是

在所谓从本国具体实际出发的口号下，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它给我们指出了客观事物、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从而才给实践活动提供了可预见性、可指导性。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世界的进步，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分不开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到孙中山，许许多多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找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而不能提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能引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追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知识分子以极大地鼓舞。他们从俄国革命成功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希望。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赢得革命知识分子的信仰，使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不能外此。

“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⑥。十月革命才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⑦它是“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⑧。从而得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革命，才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引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曾指出：“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成功和失误，也始终都是同党的理论素质，同党是否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息息相关。

但从我党历史上看，党内较多的倾向是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过程中发生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1941年，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⑩。这里总结了一条带根本性的经验。可惜的是这一认识没有引起全党充分的重视，以致在社会主义时期遭受的挫折和失败，缺乏理论依然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前，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环境，面对社会主义发展遇到暂时困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种种新问题，我们更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决策。应该看到，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过后，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和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中央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这是十分必要的。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我们从实际出发，去研究、探索，去开拓、创新，能帮助和引导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国际国内的环境和条件，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解决当前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了（即使是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当前所要改造的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因而也还不能保证对于具体实践活动在主

观指导上的正确。这是因为，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受到客观事物发展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人们主观方面的限制。“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⑪要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必须有一定实践经验的积累，从而在认识上达到对中国社会这个具体对象所包含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东西加以统一地把握。失误的情况有各种原因：可能是认识主体违背了普遍原理；也可能是，并且多半是对具体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认识不足；还可能是一些其他因素对认识的主体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对此要认真加以研究。如果不加分析，仅仅根据各别时期里某种失误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到某种挫折就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那就是片面的、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54年就曾深刻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⑫这是两条根本原理，如果怀疑，动摇这两条原理，中国就没有前途，人民就没有希望。

三、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坚持中发展，并形成新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理论要真正成为行动的正确指南，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只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马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单靠这些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他还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⑬。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所形成的新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今天这个新的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新理论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同时又是保证进一步结合好的理论前提和关键。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没有这个理论指导时，“左”的和右的错误就屡屡发生。在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解为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从1927年11月至1934年12月，在我们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都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在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和革命道路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左”的主张，其结果使党和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抗日战争初期，出现的王明新投降主义错误，从思想理论上来说，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抗日战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受旧民主主义的束缚，以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待抗日战争。上述错误都是在没有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当中国共产党一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就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取得了振撼世界的伟大胜利。

历史发展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所以全党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受过挫折、发生过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对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十二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科学地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共识，提出了十二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这十二条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她必将象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一样，将把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引向新的更大胜利。当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还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四、必须坚持与“左”、右倾错误倾向作斗争

党内的错误倾向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严重障碍，党必须经常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在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

由于产生党内错误倾向的思想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长期存在以及国际因素影响的长期存在，党内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左”的与右的错误倾向，都不可避免地会长期存在。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大敌”，我们必须长期与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必须对错误倾向的复杂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准确的把握错误倾向的性质和程度，是“左”则反“左”，是右则反右，在反右时注意防“左”，在反“左”时注意防右，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这方面，党的历史上有深刻的教训，如党的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⑭但就在反对和纠正右倾错误的时候，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当时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认为右倾是“党内最主要的危险”^⑮，“左倾的危险现在已不如右倾的那样严重”^⑯。党内逐渐形成了只许反右，不准反“左”的倾向。所以当时只能是以李立三同志的“左”去反瞿秋白同志的“左”，以王明的“左”去反李立三同志的“左”，结果是愈反愈“左”，以致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更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危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左”反“左”，“左”比右好等观点也不止一次的出现过。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的角度看，任何一种错误倾向的存在都是它所不能允许的。从两种错误倾向的性质看：右倾错误思想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是对待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即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左”倾错误思想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则是对待革命发展

问题上的空想论，即以为不经过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种错误倾向一个共同特征是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特别是后一种倾向，错误时间很长，积习很深，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严重阻力，所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反对“左”的积习，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党中央也一再指出反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特别是1989年春那场政治风波过后，中央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是中国共产党在今后长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反“左”反右两项长期任务的确定，表明我们党长期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我们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五、必须有一个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人民意愿和呼声的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保证

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是领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就不会有有作为的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和口头上。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这是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之所在。社会主义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己的事业，离开了他们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性，是没有前途的。任何相结合不集中群众的智慧、不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呼声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所谓相结合，是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内容的相结合，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绝不会自然而然的结合，它必然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实现。实现这种结合的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要从全局上深刻地了解国情及其特点。正是上述两个基本条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必然要和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人物的名字联系起来。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是集体领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由党的集体来实现和推进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凡是党的领导核心团结，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坚持得比较好的时期，党内就很少发生错误的倾向，即使发生了也比较容易克服，因此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得就比较好。凡是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的时期，“左”右倾错误也就容易出现和发展，因此，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就不可能结合好，失误就接连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就是他家长制统治方针在党内强行推行的，他压制以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陈延年、任弼时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同志的正确意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的显著特点，就是搞宗派主义，破坏党的团结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用大帽子压制不同意见，以残酷斗争的手段来保证“左”倾错误方针的推行。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渐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保证。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

后，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⑦。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率领下，全党步调一致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直至夺取全国政权。

当然我们强调集体领导，也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他们当中的核心作用。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行动构成的”^⑧。他还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他们教工人阶级认识到和意识到自己的作用，用科学代替了梦想。那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人民的功绩也可用一句话来表示：他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当然，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不能完全归功于毛泽东同志个人，应该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在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毛泽东同志无论是在开辟革命道路，制定正确革命路线上，还是形成我党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上；无论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还是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上；无论是在对错误思想的纠正上，还是用正确思想统一全党上，都表现出他做为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卓越的领导艺术与能力。他在所有这些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最伟大的，最杰出的。

但是在50年代后期，由于他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由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日益破坏，毛泽东遇有和中央集体意见不合时，就利用个人威望决定重大问题，最终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一场严重的灾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从理论、实践上清除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并把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明文规定于党章之中。党中央还明确规定，在维护领导人威望的同时，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些原则和制度，对于保证党的领导和路线的正确，对于把党的领导核心建设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实践证明，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党就能够保证自己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既使发生了错误，也能靠自身力量加以纠正；党就能够在国内外风云变幻时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东欧一些国家的和平演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领导核心分裂。只要我们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能够无往而不胜。

注释: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4页。
- ②同上,第55页。
- 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59页。
- ④《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 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7页。
- ⑥《毛泽东给罗瑞阶》(1920年11月25日),《新民学会通信集》第2集,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471页。
- ⑦、⑧《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159页。
- 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58页。
- ⑩《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
- ⑪《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 ⑫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1954年9月15日)见195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 ⑬龚育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见1983年7月8日《人民日报》。
- ⑭《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13页。
- ⑮《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111页。
- ⑯同上,第161页。
- ⑰《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75页。
- ⑱《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